

台灣政黨轉型與民眾 統獨意向的變遷

林 濁 水

(立法委員)

梁 文 傑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摘 要

一九九三年，新國民黨連線因為統獨立場的不同，宣佈脫離國民黨另組新黨。一九九六年，代表急進台獨勢力的建國黨亦自民進黨分離。與此同時，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策及意識型態上也經歷了一系列的轉變：國民黨被批評為「明統暗獨」，民進黨則被認為「漸趨務實」。本文擬自民眾統獨意向變遷的角度，來探討台灣政黨的轉型（transition）的原因與過程。本文檢討「向心競爭理論」或「趨中論」對台灣政黨轉型的解釋，在台灣這種尚處於「國家建立」和「民族建立」階段的國家，政黨與民意分佈的關係乃是辯證的交互影響，而非如上述理論所描述的單向反映。國民黨與民進黨既引導了民意的走向，亦各自調整其立場及策略，以追隨民意變遷的趨勢，獲取最大多數的選票。

關鍵詞：政黨轉型、意識型態、向心競爭、趨中論

* * *

一、前 言

一九九三年，新國民黨連線宣佈脫離國民黨另組新黨，隨即在九四年的省市長、省市議員的選舉及九五年的立法委員選舉中獲得為數可觀的選票（約為百分之十三），台灣開始由「兩黨制」進入「多黨制」的時代。一九九六年，代表急進台獨勢力的建國黨亦自民進黨分離。在新黨和建國黨相繼自兩大黨出走的同時，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策及意識型態上也經歷了一系列的轉變，國民黨被批評為「明統暗獨」，民進黨則被認為「漸趨務實」。本文擬自統獨意向變遷的角度，來探討台灣政黨的轉型（transition）的原因與過程。



二、台灣政黨轉型的意義與理論

政黨轉型涉及三個層次：根本意識型態的轉變、權力及組織架構的轉變、以及表達和實踐理念方式的轉變。在三者中，意識型態的轉變是最根本的，因為，第一，它決定了政黨在面臨各種狀況下，會提出什麼樣的行動方案與解決之道；第二，它決定了何人或何種團體可以用何種方式獲得政黨的領導權。例如，「使命型政黨」(missionary party)及「捐客型政黨」(broker party)的區別不只表示意識型態上的對立，也表示其組織方式及表達及實踐理念方式的重大差別，例如持左右兩端的英國保守黨與工黨，其組織方式便大相逕庭；而在美國，較具自由派色彩的民主黨，其表達和實踐理念的方式就比共和黨來得活潑而有創意，其候選人亦往往具備相同的特質。

當然，意識型態與其他兩個層面的互動關係並不是單向的。政黨可以因為權力及組織架構的改變，而無法維持其原有的路線^①。當政黨單純地為求勝選而採用新的競選方式時，也可能因為引進了新的物質與社會條件而不得不調整其意識型態^②。然而，我們依舊必須以意識型態作為政黨轉型的主要指標。這是因為：

(一) 意識型態是政黨競爭的主要基礎。從理論上來說，在競爭性政黨體系(competitive party system)中，政黨就像經濟市場上的廠商一樣，除了標榜其商品(政策)的「優越性」之外，還必須強調其「獨特性」。在經濟市場上，由於消費者往往沒有足夠的資訊或能力來判斷商品的優劣，或者，要獲取足夠的資訊或能力代價過高，則為了減少「判斷的成本」(the cost of making decision)，消費者多數會捨「優越性」而就「獨特性」，優先考慮「品牌」。這種現象在政治市場上亦然。多數選民在無法在各政黨為數眾多的「競選政策」中一一加以鑑別，於是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將政黨的所有政策用一個中心觀念——即意識型態——來含攝。Anthony Downs 描述這個機制如下：

選民無法詳細地知道政府有哪些決策，而除非花費大量的成本，他們也無法找到答案。即使他們知道，他們也無法預測這些決策會引導到什麼方向。……在這些狀況下，許多選民發現意識型態很有用，使他不必要再去尋找每一項議題與他自己的哲學間的關連性。意識型態讓他能專心注意政黨的差異，可以作為各種立場的樣本。利用這種「捷徑」(short cut)，選民就可以不必再花費成本去了解一大堆議題^③。

註① 例如，當政黨政治實力大幅擴張而急於徵補新進人才，或選區因為人口增長而加以重劃，或某些個人權力具有壓倒性的份量，就可能改變政黨原有的權力結構，進而導致意識型態的調整。

註② 新的選舉方式牽涉到新的物質與社會條件的運用。一個原本以工會組織為基礎的政黨如果以大眾傳媒作為主要選舉方式，則該政黨勢必要與金錢、廣告人才、媒體企業作一定的結合，也必須配合媒體宣傳的特性來界定自己的形象。當傳媒被證明為比工會組織更為有力的勝選方式，從而降低了對原有組織活動的重視程度時，該政黨的意識型態便會自然變遷。

註③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p.98.



同樣地，政黨也明白這種「自動簡化」的機制是決定選民投票的關鍵，因此不論各政黨的政策有多麼相近甚至重疊，政黨都必須「有」一種可以代表自己，並與其他政黨相區別的意識型態，而對意識型態的選擇就成為政黨能否生存甚至執政的最重要因素。

(二)在台灣，意識型態是決定選民投票行為的最主要因素，從而證實了 Downs 的推論。例如，謝復生的研究證實了台灣的選民經常把國家認同當成投票選擇的第一道門檻，在排除了國家認同上不能接受的候選人之後，再從可以接受的候選人中選出真正的投票對象^④。由於這第一道「捷徑」的把關，台灣各政黨便不得不以統獨立場及國家認同作為互相區別的首要指標，俾使「國家認同」轉化「政黨認同」。吳乃德就發現，國家認同不但是選民決定其政黨認同的主要因素，亦是台灣各政黨競爭的主要基礎^⑤；徐火炎亦支持此一結論^⑥。例如，根據「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所作的調查，民進黨的選民中有高比率的台獨支持者（49.3%），遠高於新黨（14.3%）和國民黨（14.3%），而新黨與國民黨的「統派選民」則比民進黨高出甚多（見表一）。

表一 政黨支持傾向與統獨政治選擇^⑦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其他
台灣獨立或以後獨立	14.3	49.3	14.3	22.1
維持現狀或以後再說	56.8	42.9	59.7	59.1
儘快統一或以後統一	28.9	7.9	26.0	18.8

因此我們可以說，不論是在一般的狀況下，或是在台灣的特殊狀況下，意識型態都是界定「政黨轉型」的首要指標。而在台灣，「意識型態」指的就是統獨立場及國家認同的取向，「政黨轉型」也就等於各政黨在統獨立場及國家認同取向上的轉型。台灣政黨轉型的具體表現如下。在國民黨方面，在李登輝主政下，國民黨放棄了早期的堅定統一論，逐漸轉為以「維持現狀」為基礎，而對未來採取開放性選擇的立場。至於民進黨，則由早期積極追求台獨的立場，逐漸轉為近期的「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民進黨執政後不需要宣佈台灣獨立」、「公民投票應審慎運用」的「務實路線」。問題不在於這些一般印象是不是國民黨或民進黨「真正的立場」，只要民衆「有」這樣的印象，就會決定其投票行為，從而也就決定了政黨的定位和「轉型」與否。根據民調的結果，我們發現上述說法確實符合一般民衆的印象。例如，在民進

註④ Hsieh, John Fu-Sheng, 1996,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aiwan's Party Politics," ASPA, CGOTS Working Paper。

註⑤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四期，民國八十一年。

註⑥ 徐火炎，「選舉與台灣政黨重組的趨勢」，民主鞏固或崩潰（台北：月旦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

註⑦ 同前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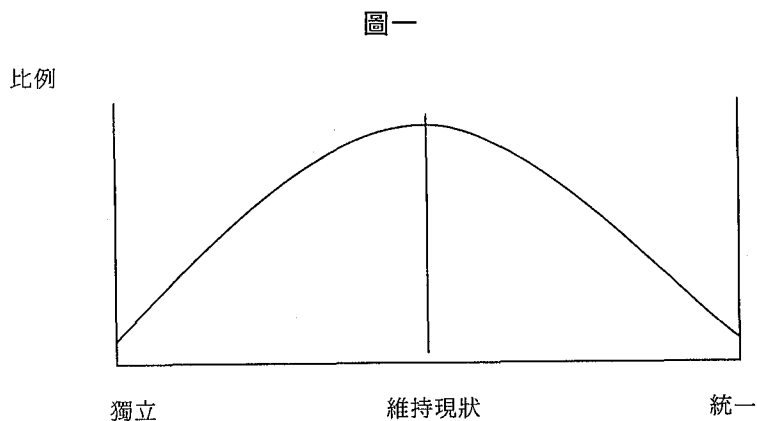


黨方面，根據民進黨民調中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份的調查，關於民進黨發表「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聲明，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二點七的民衆認為民進黨台獨立場已經變得更務實^⑧。而在國民黨方面，根據歐亞學會同時期的調查，百分之五十一的民衆認為李登輝總統大陸政策的主要目標為「維持現狀」，「盡快獨立」的有百分之十八點四，只有百分之九點五的人認為是「盡快統一」^⑨。

是什麼原因造成台灣政黨的轉型呢？為什麼國民黨會由主張統一到被批評為「明統暗獨」，而民進黨的台獨立場會「漸趨務實」？本文的看法是，是統獨意向的持續變遷促使國、民兩黨的調整其路線。讓我們先檢討目前較流行的解釋。

(一) 趨中論、危機社會理論與向心競爭

在關於台灣政黨轉型的討論中，「趨中論」(convergence theory)是一種廣被接受的說法。這種說法認為，由於中共的威脅，使得多數民衆在統獨立場和國家認同上保持審慎，統獨極端主義受支持的比例甚微，因此原來分別代表統、獨兩派的國民黨與民進黨不得不向中間靠攏，以尋求大多數選民支持。易言之，如果我們把台灣民衆的統獨立場，依其主張的強度以由左至右的「政治座標」(political scale)來表現，則將呈現環繞在「維持現狀」的「單峰分佈」(unimodal distribution)狀態(如圖一)，這正是國、民兩黨分別往中間路線靠攏的原因。



為什麼當民意分佈如圖一時，代表左、右兩邊的政黨就會往中間路線移動？

許信良首先以「危機社會理論」解釋了民進黨的轉型。所謂「危機社會」就是「這個社會的人們以國家安全為其主要考慮，因為強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即使政治開放，選民都傾向維持現制，以免新制帶來不可測的風險，在這種狀況下，選舉對反對黨不利」。由於在「危機社會」中，「任何政黨訴求只要不利於國家安全，人民就有疑慮，幾乎就沒有執政的可能」，因此民進黨想要取得政權，就必須調整過去積極追求台獨

註⑧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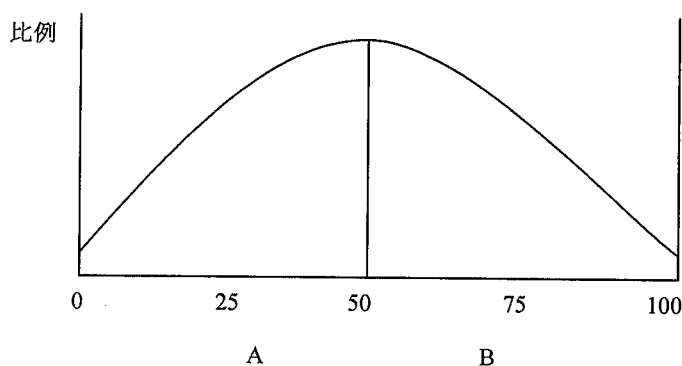
註⑨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九日，第二版。

的路線，取得選民對其執政的信賴感^⑩。

「危機社會理論」的原意，是要為民進黨的轉型尋求合理的基礎，但「危機社會理論」亦同樣可用來解釋國民黨的轉型——既然「危機社會」的多數選民都傾向維持現制，那麼「統一」也是一種會帶來不可測風險的主張，因此，國民黨轉型的原因和民進黨完全相同，只是方向相反。

明居正曾引用 Downs 的「空間類比」(spatial analogy) 及 Giovanni Sartoi 的「向心競爭」(centripetal competition) 來解釋趨中現象。Downs 認為，由於政黨的目的是追求勝選，因此當民意分佈如圖二且只有兩大政黨時，政黨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會迫使原來分別位於 25 及 75 的 A、B 兩政黨往中間方向 (50) 移動，而變得相似。在移動的過程中，A、B 兩黨可能會失去較極端的支持者，但是因為，第一，與中間可以得到的選票相比，在邊緣失去的選票微不足道；第二，即使雖然 A 和 B 的差異逐漸縮小，但對極端選民來說 (< 25; > 75)，依然是較佳的選擇 (better choice)。在只有兩黨的情況下，也是不得不然的選擇 (forced choice)，因此 A、B 兩黨都不必擔心會失去原有的選票^⑪。

圖二



明居正認為，Downs 的理論可以完滿的解釋國民黨及民進黨的「趨中轉型」。他引用謝復生的資料，認為自民國八十一年至八十五年間，「台灣選民的普遍傾向是支持台獨及統一的人數在同時快速下滑，而中間贊成維持現狀的人卻是與日俱增」，原因是，「在這段時間內，中共對我外交打壓日漸升高，台灣民衆的挫折感日強，而不斷擴大的交流及實地參訪又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維持現狀的心理，等到民國八十四年及八十五年的三次飛彈威脅後，維持現狀便成為大多數台灣民衆的普遍共識了，而這也就是向心競爭受到強化的重要原因」^⑫。

註^⑩ 夏珍，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頁二九三～二九八。

註^⑪ Anthony Downs, *op. cit.*, pp. 118~119。

註^⑫ 明居正，「向心競爭與中華民國政黨政治的發展」，理論與政策（台北），第十二卷第二期，民國八十七年，頁一五六。

(二) 對趨中論、危機社會理論與向心競爭的檢討

「趨中論」、「危機社會理論」與「向心競爭」依循的是同樣的邏輯，它們的共同假定是：

1. 民意分佈的狀況是不變的。
2. 政黨的目標、而且也是唯一的目標，是獲取最大多數的選票（vote maximizing）。
3. 民意分佈是政黨活動的「既與參數」（given parameter），政黨參考民意分佈的狀況，「理性地」選擇能獲得最大多數選票的路線。民意分佈不受政黨影響，政黨也不會尋求改變民意分佈。

很明顯，這個模型是從經濟學借取來的。在這裏，我們不需要介入經濟學的理性選擇模型是否適用於政治學的問題，也不需要把問題提高到經濟學本身的方法論難題^③。我們只要指出，把這個模型運用在台灣是有限制的。

首先，就和經濟學不討論消費者的「偏好」如何改變，因此只適用於相對靜態的世界一樣，Downs以「經濟人」（Homo Economic）概念所建構的模型，也只適用於缺乏歷史的、相對穩定的世界。更具體的說，「空間類比」或「向心競爭」較適用於像美國這樣成熟的、民意分佈長期穩定的民主國家，對那些在「國家建立」（state building）和「民族建立」（nation building）上都面臨困難且民意分佈仍有長足變動與發展可能性的國家來說，這個理論的適用性就相對薄弱了。

其次，由於這個模型假設選民的偏好及民意分佈狀況基本不變，因此政黨只能隨著現況調整自己的路線，而不能也不會企圖去改變現狀。這種說法忽略了政黨與民意之間辯證互動的關係。任何政黨都不會單純地服膺民意的要求，正如任何個人都不會完全履行社會角色（social role）所界定的行為模式^④。即使在Downs理論較為適用的成熟民主國家中，雖然政黨只是一個「民意匯集」（opinion articulation）的機構，但是由於組織內部的墮性、競爭性與維持政綱一致性的需要，匯集的過程必然會對原始的資訊作一定程度的扭曲。為了讓選民相信它所匯集的結果正是民衆的利益所在，政黨就必須主動說服選民，把選民拉向自己的立場。而在民意變動彈性仍大的國家，政黨更有充份的理由去主動塑造和界定民意。

認為政黨單純地符合選民的偏好，只是「理性選擇」模型最狹隘的運用。既然「趨

註③ 經濟學家辯稱，雖然「經濟人」（Homo Economic）的模型是對「實在」的簡化，但卻是科學思維所必需的過程。「模型」不需要與「實在」完全對應，因為「實在」過於複雜，完全對應將使思考成為不可能。因此，關鍵不在於是否簡化，而在於簡化是否有意義，只要模型能幫助我們提出更好的解釋，具有更強的預測能力，模型就是合法的。Ludwig von Mises 從新康德主義的立場，對這個問題作了迄今無人能及的討論。見《經濟學的最後基礎》（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八十年），頁一〇三～一三三。

註④ 涂爾幹（Emile Durkehim）認為「社會規則」（social rule）有如自然事物那樣客觀不變，因此「應當把社會事實（social facts）視為「物」這個命題」，就成為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基礎（涂爾幹，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商務印書館，北京，一九九五年，頁七）。然而，每一個人面在面臨社會規則的要求時，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詮釋與改造，而產生不同的行為方式。如果人完全沒有主動界定社會規則的可能，那麼「社會變遷」就不可能了，我們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同樣的角色要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扮演方式。



中理論」、「危機社會理論」或「向心競爭」都借用了經濟學的模型，我們也可以用經濟現象來說明其狹隘性。Jon Elster 曾以廠商的技術發展說明了這一點。由於技術發展需要投入相當大的資本，既不一定保證有成果，成功之後也無法完全獨佔該項技術（diffusion of technology）。於是，任何一個注重「短期理性」（rational in the short run）的廠商都不可能投入 R&D 的動力，而寧願等待別家廠商發展出成果^⑤。因此，所有投入 R&D 並成功擴展版圖的廠商，其活動模式都是「短期的非理性」（irrational in the short run）但卻「長期的理性」（rational in the long run）。另一個例子是，市場上任何廠商最安全的生存方式，就是生產已被證明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商品（符合「短期理性」）。然而，真正成功的卻是那些能創造出消費者原來不存在的需求的廠商，因此「行銷學」（marketing）的重點不是指導廠商如何出售已經被消費者接受的產品，而是指導廠商如何說服消費者接受原來不能接受的產品。同樣地，最成功的政黨不是那些完全符應民意的政黨，而是那些能界定、引導和塑造民意的政黨。

從上述的批評，我們得知用經濟學模型來解釋政黨行為的限制。「趨中理論」、「危機社會理論」、「向心競爭」的兩大限制是：第一，它忽略了民意大規模變遷的可能性，因此較不適用於民意變動可能性高的國家；第二，它忽略了政黨積極塑造民意的一面，因此沒有掌握政黨與民意之間的辯證發展關係。Downs 本人也明白承認上述的批評，他說：

迄今的討論清楚地顯示，國家政治生活發展的基本決定因素是選民在政治光譜上的分佈（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olitical scale）……這個重要的參數是怎麼形成的呢？從一開始討論，我們就假設選民的偏好是固定的，這就是說，選民的分佈是既定的，因此我們直到現在都迴避了這個問題。即使是現在我們依舊無法回答，因為這個決定性因素既是歷史的、文化的、心理的、也是經濟的。……我們只能說：(1)民意的分佈是形塑國家政治生活的關鍵因素；(2)民意的重大變動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3)雖然政黨在某些情況下會在意識型態上向民意的分佈作調整，他們也會企圖讓選民往他們的立場移動，也就是改變選民^⑥。

三、台灣民衆統獨意向的變遷

實證資料顯示，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台灣民衆在統獨意向有明顯的變異，而非如趨中論者所假設的穩定狀態。

目前對統獨意向的調查有三種方式。「三分法」（贊成獨立、維持現狀、贊成統一）測量的是「國家選擇」，即詢問民衆「想要成爲哪一個國家的公民」；「文化認

註^⑤ Jon Elster,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註^⑥ Anthony Downs, *op. cit.*, p. 140。



同」(我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測量的是主觀的情感和心理認同。「六分法」(立即獨立、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獨立、永遠維持現狀、先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立即統一)測量的是「策略選擇」,即詢問民衆「在國家選擇確定的情況下,傾向以何種方式達成其目的」。以下分別論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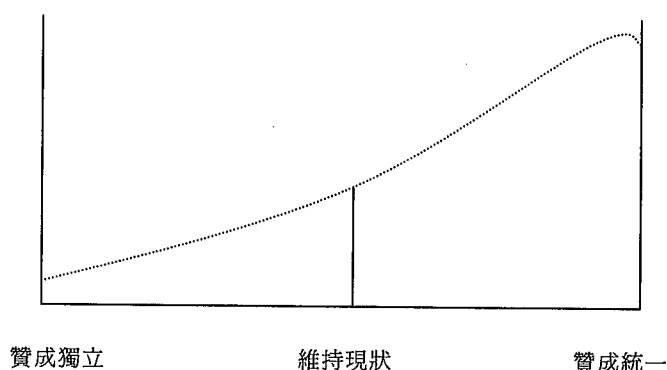
表二列出以「三分法」(贊成統一、維持現狀、贊成獨立)為基礎的各次民調結果。

表二

單位	時間	贊成獨立	維持現狀	贊成統一	無意見
中國時報	1990\10	4.0%	28.0%	51.0%	17.0%
中國時報	1992\05	4.0%	44.0%	33.0%	19.0%
中國時報	1993\09	10.0%	46.0%	29.0%	15.0%
中國時報	1994\04	15.0%	44.0%	22.0%	19.0%
聯合報	1994\07	17.0%	34.0%	26.0%	23.0%
中國時報	1995\01	10.0%	59.0%	15.0%	16.0%
中國時報	1995\07	17.6%	57.4%	17.2%	7.8%
聯合報	1995\07	15.0%	42.0%	20.0%	23.0%
聯合報	1995\07	14.0%	46.0%	20.0%	20.0%
中國時報	1995\07	12.4%	50.0%	20.7%	16.9%
聯合報	1995\08	15.0%	44.0%	19.0%	22.0%
中國時報	1995\10	10.0%	55.0%	19.0%	16.0%
聯合報	1995\11	12.0%	45.0%	19.0%	24.0%
聯合報	1996\01	14.0%	49.0%	17.0%	20.0%
聯合報	1996\02	14.0%	45.0%	17.0%	24.0%
聯合報	1996\03	17.0%	46.0%	16.0%	21.0%
聯合報	1996\03	16.0%	46.0%	17.0%	21.0%
聯合報	1996\09	19.0%	42.0%	19.0%	20.0%
聯合報	1996\12	21.0%	45.0%	19.0%	15.0%
聯合報	1997\01	20.0%	41.0%	19.0%	20.0%
聯合報	1997\04	17.0%	45.0%	17.0%	21.0%
聯合報	1997\05	21.0%	44.0%	16.0%	19.0%
聯合報	1997\06	20.0%	43.0%	16.0%	21.0%
聯合報	1997\07	24.0%	43.0%	19.0%	14.0%
蔡壁煌	1998\08	23.0%	42.0%	13.3%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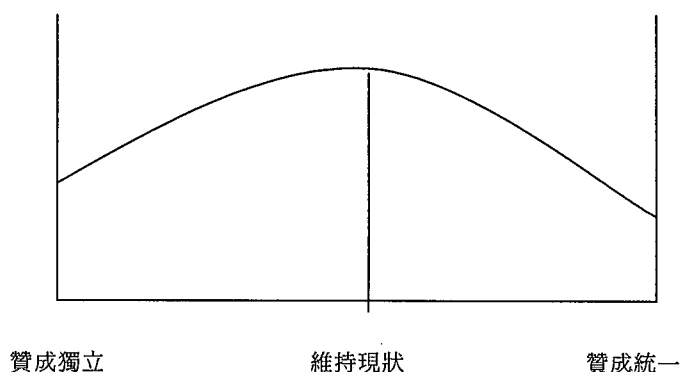
根據表二，一九九〇年台獨言論禁忌剛剛打破不久時，「贊成獨立」的民衆僅有 4%，「維持現狀」者也只有 28%，「贊成統一」的民衆則高達 51%。很明顯，當時的「主流價值」是「統一」，其民意分佈狀態應如圖三之「偏右」（skew to the right）的「單峰分佈」狀態。

圖三 一九九〇統獨民意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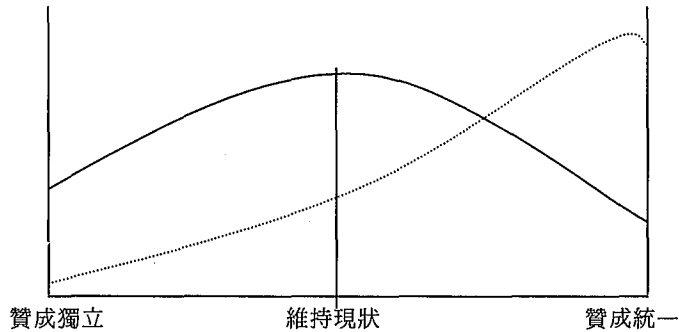
從九二年開始，民意分佈開始大幅轉變：「贊成統一」的比例大幅大降，從九五年之後，一直維持在 15 到 19 之間，最近一次民調（98\08）更降至史無前例的 13.3%；與此同時，「贊成獨立」的人口大幅上升，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總統大選及中共導彈演習之前，曾數度超過「贊成統一」的人口（1995\07；1996\03），而自九六年十二月之後，「贊成獨立多於贊成統一」的民意結構已經相當穩定。圖四表示九六年至今的統獨民意分佈。

圖四 一九九八統獨民意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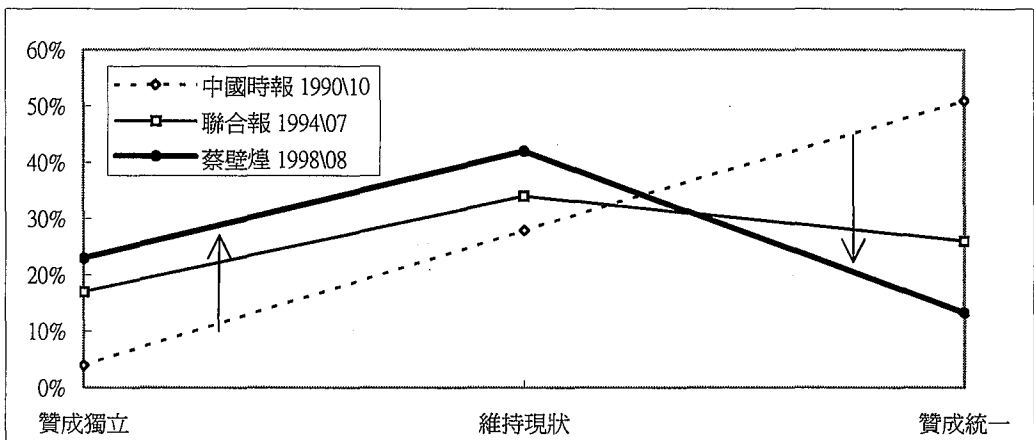
將圖三和圖四結合為圖五，我們發現，原來「偏右」的單峰分佈轉變為「趨中而稍偏左」的單峰分佈，峰頂大幅左移，表示民意分佈呈現「由統至獨」的轉移趨勢。

圖五



我們將表二的資料以四年為一間隔繪成圖六，以具體反映圖五所示的變動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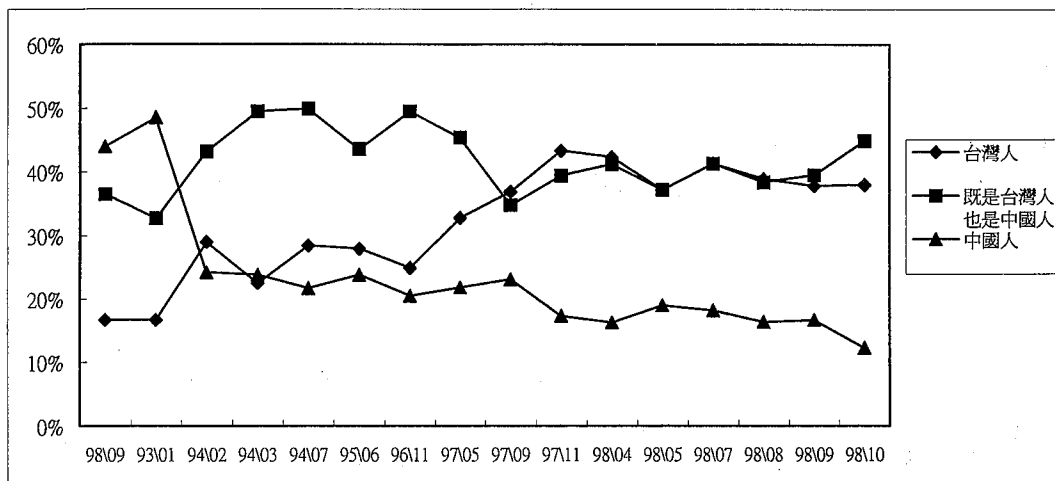
圖六



在「文化認同」上，根據陸委會的調查（圖七），從一九九二年九月到一九九八年十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從 44% 下降到 16.4%，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從 16.7% 上升到 38%，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從 36.5% 上升到 44.9%，顯示「台灣認同」已經凌駕「中國認同」，「文化認同」與「國家選擇」的變遷正相呼應。

把「三分法」改為「六分法」，製成表四及圖八，可以看出民衆在「策略選擇」上雖然略有波動，但總體變化幅度並不大。主張「暫時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和「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一直在 50% 以上，若再加上「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獨立」的民衆，則主張「至少目前維持現狀」者總計在 80% 以上。這顯示出，台灣民衆在「策略選擇」上採取較審慎的態度，這也是所謂「主流民意」之所在，也是「危機社會理論」和「趨中論」的立論基礎。

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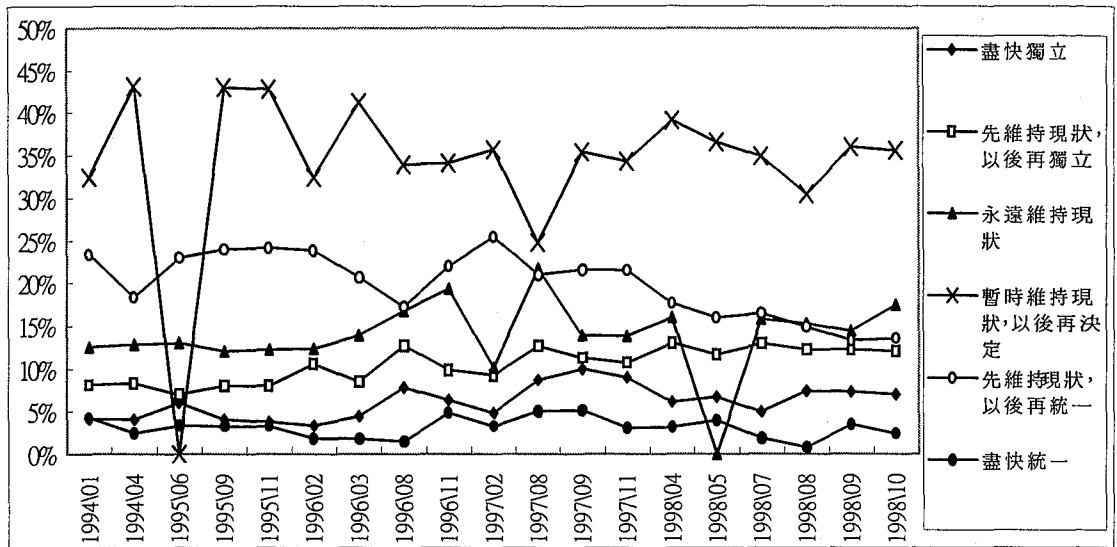


表四

執行單位	日期	盡快獨立	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獨立	永遠維持現狀	暫時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	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	盡快統一
陸委會	1994\01	4.1%	8.1%	12.5%	32.4%	23.4%	4.2%
陸委會	1994\04	4.0%	8.3%	12.8%	43.1%	18.3%	2.5%
陸委會	1995\06	6.0%	7.0%	13.0%	32.0%	23.0%	3.4%
陸委會	1995\09	4.0%	8.0%	12.0%	43.0%	24.0%	3.3%
陸委會	1995\11	3.7%	8.0%	12.2%	42.8%	24.2%	3.3%
陸委會	1996\02	3.4%	10.6%	12.3%	32.4%	23.9%	1.9%
陸委會	1996\03	4.4%	8.5%	13.9%	41.2%	20.7%	1.8%
陸委會	1996\08	7.8%	12.7%	16.8%	33.9%	17.3%	1.5%
陸委會	1996\11	6.3%	9.9%	19.3%	34.1%	22.0%	4.8%
陸委會	1997\02	4.8%	9.3%	10.2%	35.7%	25.4%	3.3%
陸委會	1997\08	8.7%	12.6%	21.7%	24.8%	21.0%	5.0%
陸委會	1997\09	10.0%	11.2%	13.9%	35.4%	21.6%	5.1%
陸委會	1997\11	9.0%	10.7%	13.8%	34.3%	21.5%	3.1%
陸委會	1998\04	6.1%	13.0%	16.0%	39.2%	17.7%	3.2%
陸委會	1998\05	6.7%	11.6%	17.2%	36.6%	16%	3.9%
陸委會	1998\07	4.9%	12.9%	15.8%	34.9%	16.5%	1.9%
陸委會	1998\08	7.4%	12.2%	15.3%	30.5%	14.9%	0.8%
陸委會	1998\09	7.3%	12.2%	14.4%	36%	13.3%	3.5%
陸委會	1998\10	7%	12%	17.5%	35.6%	13.5%	2.4%



圖八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在「國家選擇」上，從九〇年開始，台灣的民意分佈由原來「偏右」的單峰分佈逐漸「左移」為「趨中而稍偏左」的單峰分佈。峰頂大幅左移，呈現「由統至獨」的轉移趨勢。

第二，在「文化認同」上，「台灣認同」逐漸凌駕「中國認同」，與「國家選擇」的左移變遷相一致。

第三，在「策略選擇」上，呈現大致持平的狀況，「至少目前先維持現狀」為主流民意，顯示台灣民衆對安全問題採取審慎態度。

四、統獨意向的變遷與政黨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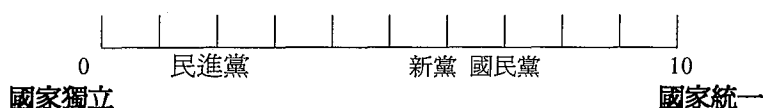
(一) 相對轉型與絕對轉型

統獨民意分佈的左移現象讓我們得以重新評估統獨意向的變遷與政黨轉型與重組的關係。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為各政黨的屬性作定位。謝復生主持的研究曾要求受訪者在零至拾的光譜上為各政黨定位，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一千多位受訪者的中數為5，國民黨被定位在7，民進黨為2，新黨則為6（見圖九）^⑦。

註⑦ Hsieh, John Fu-sheng and Emerson M. S. Niou, "Salient Issues in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oral Studies* (Taipei), vol.15, no.2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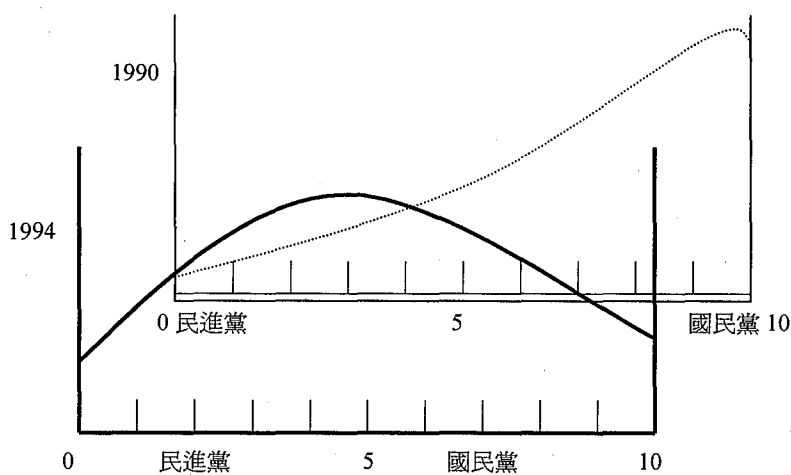
圖九



謝復生的研究時間是在一九九四年初，當時李登輝已經主政七年，且廣被批評為「明統暗獨」或「獨台」，可以推估國民黨在一九九〇年的位置應該是9甚至是10。民進黨在九四年被定位在2，符合一般的印象，但令人疑惑的是，在一九九〇年左右，民進黨還被認為是「激進黨」與「暴力黨」，其定位應該是1甚至是0，而從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四年初，民進黨在統獨問題上並沒有今日所言的「轉型」問題，也沒有任何具有影響力的領導人表示「民進黨執政後不必也不需要宣佈獨立」。更有甚者，就民進黨在這段時期所通過的一些文件如九〇年的「四一七決議文」、九一年的「台獨黨綱」來看，民進黨實質是「更獨」而不是「更統」。那麼，為什麼從九一年到九四年，在民衆心中，民進黨的定位是向右移而不是向左移？

最好的解釋是，變化的不是民進黨，而是民衆本身。假設民進黨在一九九〇年的定位為1，由於民衆觀點的「左移」，相對來說，民進黨的立場就變得較為溫和，而「相對移動」到2。進一步推論，由於民意往左邊移動，因此，國民黨從一九九〇到一九九四年間的左移幅度，實際上要比選民眼中所見的要大得多。也就是說，如果在「相對距離」上國民黨左移了2個單位，則其「絕對距離」應該為4甚至是5。圖十表示這種相對距離的變化。

圖十



因為「相對移動」而造成的「轉型」，可以稱為「相對轉型」（relative transition）。「相對轉型」是我們反駁「趨中理論」、「危機社會理論」與「向心競爭」的基本論點。「相對轉型」的現象顯示出：

1. 政黨可以在不改變自己路線的情況下，將選民拉向自己的立場。而只要該政黨有理由相信可以改變選民的偏好，這個選擇就是理性的。

2. 政黨的「轉型」可能來自於民意分佈本身的轉變，而不一定來自於政黨的移動。

3. 「趨中」或「向心競爭」不一定是兩黨同時分別向左及向右移動，而可能是其中一黨朝著另一黨移動。

「相對轉型」的觀點告訴我們，所謂的「政黨轉型」，應該是指政黨意識型態與民意分佈的相對位置，而不是指政黨意識型態的絕對位置。例如，當民意分佈向左移動時，原來的「左派政黨」就會相對向右移，在選民眼中，這個政黨就顯得「溫和化」和「趨中化」了。而原來的「右派政黨」如果不調整自己的路線，在選民眼中就會顯得「激進化」。從九〇年到九四年的民進黨是「相對轉型」的代表，而由於國民黨在選民眼中不但沒有激進化，反而越來越趨中，我們可以確定國民黨從九〇年到九四年經歷了「絕對轉型」（absolute transition）。

九四年後的情況如何呢？讓我們分別檢視國民黨與民進黨：

(二) 國民黨的轉型

由於民意向左移動的趨勢繼續進行，因此我們可以預測，為獲取最多數的選票（即追求民意分佈的「波峰」），國民黨在統獨立場上會繼續向左移，而且其「絕對移動」的幅度要比選民眼中所見的幅度（即「相對移動」）要大得多，兩黨在統獨立場上會越趨接近。此外，由於民意向民進黨趨進，因此為了掠奪民進黨的選票，國民黨甚至會採取比民進黨更「激進」的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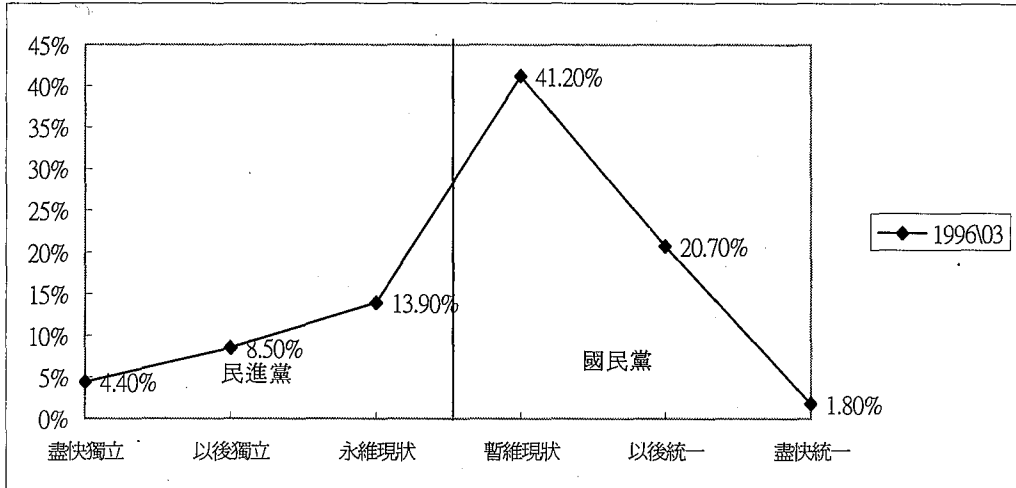
上述的推論已被實際政治演變所證實。從九二年開始，在進行了一連串屬於民主層次的改革之後，由李登輝主導的國民黨開始進行被視為具有「獨台」意味的改革。九一年國代選舉時，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以總統「委任直選」為基礎，高舉反台獨標誌，強調國民黨必須在修憲國代掌握主導權，否則台灣未來將陷於不可測。然而到九二年三月國民黨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李登輝讓原本規劃完成的「委任直選」扭轉為「直接直選」，並在當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國民大會通過「正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之」的修正案，並訂定一九九六年第九任正副總統選舉實施的時間表，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前召集臨時會議決定。「直選案」雖未明文通過，但實際上已成非選不可之勢。

在確定總統直選和自己是唯一能代表國民黨的候選人之後，李登輝便相當理性地採取追求最大多數選票的行動，亦即，讓國民黨隨著民意一起往左移動。九四年千島湖事件以後，聯合報民調的「贊成獨立」者大幅上漲了16%，「贊成統一」者則下降了13%，李登輝責罵中共「康固力」（頭腦僵硬）精準地掌握了民意變化的趨向。九五年春，就在兩岸因為「江八點」、「李六條」而似乎進入全面和解狀態時，李登輝於六月前往康乃爾大學演講導致中共在七、八月舉行兩次導彈演習，並無畏於新黨及國內黨內非主流派的指責，繼續維持強硬路線直至總統大選結束，終以百分之五十四的高得票率輕鬆贏得選舉。



當然，在帶領國民黨向左移動的同時，李登輝亦刻意維持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左右位置上的排序。亦即，不管民進黨與國民黨在統獨立場上有多接近，國民黨既不會向左「越過」民進黨，也不會讓民進黨向右「越過」國民黨。這是因為：第一，有區別的意識型態是各政黨用以分割選民的「品牌」和「捷徑」，不論各政黨在實際上有多麼相似，政黨都必須維持和他黨的區別。第二，為了顯示自己是唯一有能力主導兩岸關係以及與中共溝通的政黨，要繼續維持這種優勢，國民黨就必須站在比民進黨「稍右」的位置。

圖十一



圖十一為九六年三月總統選舉前的統獨意向分布圖，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定位以謝復生九四年的調查為準。可以看出，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國民黨的策略是相當正確的。在兩大黨競爭單一職位，且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相對位置維持如圖十的狀況下，民進黨頂多能爭取到「盡快獨立」、「以後獨立」、「永維現狀」的選民，合計為26.8%。國民黨除了能爭取到「盡快統一」、「以後統一」、「暫維現狀」的選民（合計為63.7%），亦有越界爭取「永維現狀」與「以後獨立」選民的能力。這是因為國民黨擁有比民進黨雄厚許多的外交和國防的經驗和人才。多次民調結果皆顯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認為國民黨最有能力保衛台灣的皆有四成以上，而認為民進黨最有能力保衛台灣的，則僅有一成出頭（見表五）。在這種狀況下，對主張「永維現狀」或「以後獨立」而不欲立即改變現狀的選民來說，即使國民黨的與其他的政黨定位相距較遠，國民黨還是較佳的選擇。簡言之，國民黨可以將自己與民進黨區隔為「有能力的台獨」與「無能力的台獨」之差，以此襲奪民進黨的固有票源。九六年總統大選時，李登輝面臨代表統派勢力的林洋港及陳履安的挑戰，兩者合得24.9%。但李登輝卻能成功地襲奪彭明敏的選民^⑩。從表六和表七可以看出，李登輝對彭明敏之優勢，在於

註^⑩ 民進黨中央黨部的《一九九六總統暨國大選後檢討報告》指出，「從選舉結果看，以『台灣獨立』為中心的選戰並沒能席捲所有台獨票源，反而流失約四成的台獨選票到李連陣營，這明白顯示，競選總部高估台獨票源的凝聚力和對彭謝的向心力，同時低估李登輝情結對民進黨票源侵蝕的嚴重性」。

證明其在推動台獨的同時，又有能力維護台灣安全。從選戰結果來看，這個策略完全正確。

表五 最有能力保衛台灣安全的政黨

選 項	百 分 比	
	1995	1998
國 民 黨	50.16	40
民 進 黨	11.04	10
新 黨	13.7	1.5
很難說/不知道	25.73	49.5
合 計	100.00	100.00

(國民黨中央政策會一九九五年調查；歐亞學會一九九八年調查)

表六 在面對中共的威脅時，誰最能確保台灣人民的利益

選 項	百分比
李 登 輝	32.8%
彭 明 敏	6.2%
林 洋 港	12.0%
陳 履 安	3.7%

(民進黨中央黨部 一九九六總統暨國大選後檢討報告)

表七 誰最有能力化解台海緊張局勢

選 項	百分比
李 登 輝	31.0%
彭 明 敏	6.5%
林 洋 港	8.5%
陳 履 安	3.9%

(民進黨中央黨部 一九九六總統暨國大選後檢討報告)

(三) 民進黨的轉型

從「相對移動」和「相對轉型」的角度來看，民進黨從九〇到九四年間的變動與其說是順著民意「轉型」，倒不如說是因為統獨意向分佈的改變，而相對地向右移動。民進黨未曾追尋「主流價值」，卻逐漸創造出主流價值。在這段時間內，民進黨亦因為民意結構的改變而得以擴張選票。

九六年以後，民進黨進入一個較為分歧的階段，分歧的來源主要是總統選舉的慘



敗。前面已經指出，雖然在「國家選擇」和「文化認同」上，台灣民衆的統獨意向呈現了大幅度的「右移」，但是在「策略選擇」上，則主張「至少目前先維持現狀」的比例一直維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並且符合「趨中論」的說法，呈現出如圖十一的「偏右單峰分佈」。既然如此，民進黨就不得不隨之調整。

自九四年以來（特別是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之後），民進黨即逐漸調整其追求獨立的「手法」及「速度」。自九八年起（特別是九八年二月「中國政策研討會」之後），民進黨對於與中國交往及談判的策略上亦有所調整。但是，如果我們談的是「國家選擇」（「贊成獨立」、「維持現狀」、「贊成統一」的「三分法」），而不是「策略選擇」（即「儘快獨立」、「以後獨立」、「暫維現狀」、「永維現狀」、「以後統一」、「儘快統一」的「五分法」），則民進黨的基本意識型態依舊未有變動。

根據第一節曾經討論過「政黨轉型」的三種層次，我們認為，民進黨從九四年以來的轉變，主要是在「表達理念的方式」上^⑩，而不是在「意識型態」上。第四節指出，主張「暫時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和「永遠維持現狀」比例一直在50%以上，若再加上「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先維持現狀以後再獨立」的民衆，則主張「至少目前維持現狀」者總計在80%以上，為求獲得最多數的支持，民進黨必須在策略與手段上作調整。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落敗以後，民進黨內有人主張以修正台獨黨綱的方式贏得多數支持，至九九年五月八日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民進黨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為「台獨務實派」正式下了註腳。但「台灣前途決議文」所呈現的轉變，只侷限於對台獨「手段」與「策略」的轉變，也就是表達和實踐理念方式的轉變，而不是從根本意識型態上「放棄台獨」。「台灣前途決議文」開宗明義即主張，「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片面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國兩制』根本不適用於台灣」，顯示民進黨的根本意識型態並未改變。相較於九一年的「台獨黨綱」台灣尚未獨立，因此必須積極地以公民投票方式「制憲建國」，「決議文」則站在台灣已經獨立的立場，消極地將公民投票視為保障獨立現狀的安全機制。

為什麼民進黨只能在策略上而非根本意識型態上作調整呢？正如前面所言，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區隔只是「有能力的台獨」與「無能力的台獨」，而不是「台獨」或「非台獨」。在這種狀況下，民進黨放棄台獨反而是不理性的，這是因為：第一，第二節曾經指出，所有投入R&D並成功擴展版圖的廠商，都必須把「短期的非理性」（irrational in the short run）與「長期的理性」（rational in the long run）結合起來。但對民進黨來說，在統獨意向尚未「固著」，反而持續「左移」的情況下，其「未來選票期待值」大於「現在選票期待值」，放棄原有的意識型態，不僅在短期是非理性的，即在長期亦屬非理性，因此根本缺乏改變意識型態的誘因；第二，如前所述，為了顯示自己是唯一有能力主導兩岸關係進展程度的政黨，國民黨必須佔據比民進黨「稍右」的位置，當民進黨往右靠時，國民黨也會往右移動。國民黨會刻意保持與民進黨的左

註⑩ 如九四年市長選舉時的「快樂、希望」，九七年縣市市長選舉的「辣妹助選團」等。



右排序，從而使民進黨不可能藉著「右移」襲奪國民黨的票源^②。

因此，民進黨當前最理性的策略不是由「獨」變「統」，而是由「無能力的台獨」變成「有能力的台獨」，即在形象上、人才培養上、政策擬定上，扭轉民進黨的不利地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在詮釋「台灣前途決議文」時表示，「現在，我們的任務不再是單純地宣揚台灣獨立，而是以具體措施維護台灣獨立，保障台灣獨立」^③；「決議文」起草者立委林濁水亦表示，「決議文並不代表台獨價值的放棄，而是在路線、策略上的重大調整」^④，兩者皆清楚表示出「決議文」的策略意含。

五、結 論

從理論面和台灣實際狀況的檢討，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一) 對那些尚處於「國家建立」(state building)和「民族建立」(nation building)階段的國家，民意是非固定的、可引導的、從而有大幅變動可能性的。在這樣的國家中，政黨的角色往往不是消極地回應民意，而是積極地引導和塑造民意。台灣正是這樣的國家。

(二) 因為「空間類比」或「向心競爭」的政黨競爭與轉型的理論，是以民意固定分佈和政黨對民意的消極性為前提，這個理論就難以解釋台灣政黨的轉型。

(三) 台灣民衆統獨意向長期「左移」的趨勢，促使國民黨不得不向左移動追求民意。在「左移」的趨勢下，民進黨的基本價值得以保持不變，並得以擴大其選票基礎。在根本意識型態上，民進黨的「轉型」只是「相對轉型」而不是「絕對轉型」。但在表達及實踐理念的方式上，由於國民黨的移動有效地侵佔了民進黨的票源，因此民進黨亦不得不隨之調整。

(四) 在「左移」趨勢持續不變的情況下，國民黨不可能回頭向右移動，而民進黨亦只能調整其策略而非根本意識型態。未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競爭將不是「統」與「獨」的競爭，而是「有能力的獨」與「無能力的獨」競爭。

* * *

註^② 這種情況發生在九八年民進黨舉行中國政策研討會之後。會後，由於民進黨採取較開放，海基會感受到壓力，便立即對海協會的來函加以正面回應，旋即在四月中重新調整談判班底，安排原陸委會企劃處長詹志宏出任海基會副秘書長，並於四月底前赴中國；經濟部投審會亦在五月中放寬對中國投資項目的限制，適度地調整了「戒急用忍」政策。

註^③ 民主進步黨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九九年五月，林義雄主席開幕致詞。

註^④ 林濁水，「從脫華論到華人世界的和解」，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七日，第十一版。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ing Independence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Choshui Lin

Wenchieh Liang

Abstract

Since 1993, party transition has occurred in the two major parties in Taiwan. On the one hand, the Kuomintang is criticized for its pretended willingness to reunite with Mainland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s also blamed for its increasingly practical position in the pursuit of Taiwan's independenc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and tries to find the causes and reasons of the transition in light of the shifting distribution of people's opinion on re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After examining the dominant explanation, the convergence theory or centripetal competition,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in a state like Taiwan which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party and people's opinion is dialectical and interactive, instead of being a static reflection as described by the convergence theor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PP both shaped the dir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eople's attitude toward reunion and independ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shifted their positions and strategies in order to follow the redirected attitude and to gain the largest portion of voters.

Keywords : party transition, ideology, centripetal competition, convergence theory

